



西方批判理論評析

Antonio Gramsci

Jean-Paul Satre

Herbert Marcuse

Erich Fromm

Claude Levi-Strauss

Louis Althusser

Jürgen Habermas

魯凡之著

西方 批判理論評析

魯凡之著

曙光圖書公司出版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序

這本書所收輯的八篇文章，都是我自一九七八年底由法國回來香港以後，陸續在香港各種報刊上所發表的；三年多來，我所寫有關西方新思潮及批判理論的文字，積累已超過十多萬字，承蒙「曙光」書會之協助，得以結集成本書出版，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我實在殷切期望，香港以至整個中國，對西方文化思潮及社會理論的研究，今後能夠更加得到重視，及將研究水平迅速提高。

這裏所收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之間，我分別發表於香港「新一代」雙周刊、「新社會」季刊、「財經日報」副刊專欄、「文匯報」之「筆匯」及副刊專欄、「新晚報」之「風華」等多處的。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國慶節

目錄

(I) 葛蘭西的革命思想	1
(II) 兩悼沙特	53
關於“人”和“左派”的“現代啓示錄”	
“一個人”的解放實踐與理論	
(III) 馬爾庫塞與“新人文主義”解放理論	69
(IV) 論佛洛姆	90
(V) 利維·史陀·潛意識·結構主義	113
(VI) 垂爾杜塞爾與「超結構」理論	128
(VII) 哈伯爾梅斯“理性社會論”與香港前途	137
談「歐洲共產主義」的三個問題	156

(I)

葛蘭西的革命思想

(一) 前言

「我是戰士，是在今天的戰鬥中運氣不好的戰士，如果戰士去戰鬥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覺自願的，人們是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為他們哭泣的。」（1）

這是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被墨索里尼非法逮捕（2）後，在獄中給他母親傳的話。戰後以來，隨著葛蘭西「獄中筆記」（“QUADERNI DEL CARCERE”）的發表，給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界引起了極大衝擊，流波所及，各家各派無一不受影響；以至可以說，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葛蘭西已確定無疑地被公認為西方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權威。偉大革命家的思想得到承傳和被充分重視，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在這股潮流裏，人們却可以看到在若干方面發展出一些局部現象，葛蘭西的本質被闡割歪曲。在某些思

潮派別的引証論述之下，葛蘭西恍惚只是一個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文化理論有創見和影響的「知識份子」，而完全抽空了他的人格本質和整體理論架構，也就是抽空了他的「文化結構」理論的有機整體內容。

誠然，葛蘭西的確是「我們時代的真正知識份子英雄」（3）；但葛蘭西本人，却首先將自己介定為「戰士」——「工人階級的戰士」——「革命者」。他曾說：

「只有那些在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的時候能夠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鍛鍊得堅如刀劍的人，才配稱為工人階級的戰士，才配稱為革命者。」（4）

他自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自己的信念的——按照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I）（5）的描述，葛蘭西的第一個特點，便是理論與實踐高度統一；以至他作為「一個人」，同時也就是一個「行動中的思想與人」（6）。葛蘭西的一切理論，都與他的革命實踐、革命人格息息相關，不可分割（他亦因此而成為悲劇英雄式的烈士）。因此在了解葛蘭西思想之前，應先確定地知道這個人的具體本質——正如恩格斯給馬克思所做的評定一樣，葛蘭西在作為一個卓越的「思想家」之前，首先是一個永不屈服的「革命人」！

（二）「人本」理論與對「抽象人」的批判

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可說是在作為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主義社會、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綜合產物的古典馬克思主義之外，再加上意大利人文主義哲學〔維科（GIAMBATTISTA VICO）、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政治〔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思想綜合的批判發展。那是馬克思主義的拉丁化。正是意大利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歷史唯心

主義傳統，使葛蘭西思想得以像馬克思、恩格斯本人那樣，直接對黑格爾式意識形態的批判掛鉤，並作為哲學上發展的起點。陶里亞蒂就曾描述過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特徵，他說：

「到達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不只一條。我們走的是馬克思本人所走過的道路，即以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作出發點的道路。有人也許會說這個出發點的合法性比起下列各出發點來更少一些，例如數學的出發點，人道主義的出發點，文學的出發點，宗教信仰的出發點（為什麼不可能這樣呢？）。而我們却認為，和別的任何一條道路比較起來，我們所走的道路是一條最可靠、最有好處的道路。」（7）

唯心主義的出發點，使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較少沾染二十世紀初期盛極一時的實証主義，也使葛蘭西在完成一個「反杜林」式的「反克羅齊」（ANTI-CROCE）批判（8）之後，在既反對布哈林機械唯物論、又反對費爾巴哈抽象「人的本質論」的兩面作戰中，得以保存馬克思的「人本」理論（那在當時成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裏，已完全被闖割），並與經濟基礎論綜合發展而成為著名的「結構／超結構」辯證互動理論（這是葛蘭西思想的創造性貢獻之一，後面會詳談）。歷史事實證明，重覆一次「黑格爾道路」的「好處」，正在於保衛及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裏的「人本」中心價值（在中國，毛澤東思想形成時的「儒家人文主義」和「道家辯証法」——傳統唯心主義出發點，也達到相同的客觀效果；毛澤東思想和葛蘭西思想在很多方面的類似性，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就葛蘭西本人來說，對「人」這種能動的「物」、「人」自己看來應屬「本體」的「物」的高度重視，其思想是貫串終生的。一九一一年，二十歲的青年葛蘭西便曾寫道：

「人，當他們逐漸感覺到他們的力量並意識到他們的責任與他們的價值時，就不會再忍受其他人強加於他們的意願，及

要求取回支配他們行動與思想的權利。」（9）

是哲學上的「人文主義」與政治上的「人權」（「人的價值」）思想，使葛蘭西走向馬克思主義和階級覺悟；但「人」也正是，（同時是他思想成熟後）「階級論」所要辯証回歸的本源。費爾巴哈的「人教」或「人學」膜拜一種抽象的「人的本質」，認為客觀歷史發展不過是它們的具體「演化」；機械唯物論則實質上是一種宿命唯心主義，「人」的歷史變成一部純粹「物」的歷史，「人」淪為完全受一般「物」支配的次級「物」、根本不了解社會一切「物的關係」（如生產關係等）本質上亦由人之間的能動關係所構成。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一定社會關係（在階級社會則包括階級關係）的產物，但他同時可在這種社會關係所提供的具體條件上，能動地反過來改造社會關係、創造歷史。「人」始終是唯一能動的「本體」——世界上沒有抽象的「人的本質」，但也沒有不由「人」創造並構成的抽象的「社會關係」。到「獄中筆記」時期、成熟的葛蘭西便寫道：「那裏沒有抽象的『人的本質』，固定不變的（這是某種來自宗教及超越性思想的概念）。」（10）

「那種『人的本質』就是『社會關係綜合體』（**COMPLEX OF SOCIAL RELATION**），可說是最滿意的答案了；因為它包括『變化』（**BECOMING**）的觀念（人乃『變』**BE COMES**，他在社會關係的改變中繼續改變自己），也因為它否認『一般的人』（**MAN IN GENERAL**）。社會關係確實是各種人的集團的表現，其間每一個都以其他集團的存在互為前提條件，而他們的聯合則是辯証的、非經常的。人是貴族，正如人是奴隸一樣，等等。」（11）

「『人是什麼？』（**WHAT IS MAN?**）我們的意思就是：『人能變成什麼？』（**WHAT CAN MAN BECOME?**）」。（12）

具體「人格」並非由於存在於某處的「抽象人性」的演化

，而是具體「人」在與具體社會關係互動演變中的一種「變」。在葛蘭西看來，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運動」、一個「成長」；那一方面是既定客觀社會關係的產物，另方面則是「人」自我主觀塑造的過程。他說：

「人創造他們自己的個性，……『人』可以想象為一種『歷史組合』（**HISTORICAL BLOC**），由純粹的個人及主觀因素，與羣衆及客觀或物質因素所構成，而個人則在其中處於一種能動的關係裏。改造外在世界、一般的關係制度，就是賦予一個人以潛力，給予一個人以發展。」（13）

換句話說，「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自身。這種哲學思想，必然發展出對「人」的發展潛質（可塑性）的高度估計，必然發展出一種期望優秀人格的「新人」觀念。葛蘭西將共產主義革命的根本放到「人格革命」上，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不過為此創造社會關係條件而已（這決定了葛蘭西思想的反斯大林主義本質）；他在籌劃創建意大利共產黨時，曾經寫道：

「要征服的對手將不再在無產階級以外，將不再是有限的及可以控制的物理性外在力量，敵人將在無產階級自己內部，在他們的無知、懶惰、理解的遲鈍，當階級鬥爭的辯證法內在化並促使每一個個體人意識為新人時，他的每一行為，都向躺臥在隱伏處的『資產階級開戰』。」（14）

是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的發展，使現代「無產階級」成為一種「客觀可能」的革命階級；但構成「無產階級」的每一個「無產者」個人，却必須進行主客觀結合的「人格革命」，方可能成為「客觀真實」的革命人。「無產階級」要在確實由「革命人」（革命無產者）組成的時候，才由「客觀可能」轉變為「客觀真實」的「革命階級」。儘管「無產階級先鋒隊」（先成革命人者的組合），可以解決若干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關係革命和策略問題，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任務——創造

更能解放「人」主觀能動性的生活方式（社會關係）、塑造更進步的人格類型（「新人」），却只有由「無產階級」整體的「革命人化」來完成（「階級論」向「人本論」的辯証回歸）。人類必須展開一場「雙重革命」——一方面是多數人（勞動者）對少數人（剝削者）的革命（這是「傳統革命」），另一方面是少數人（革命人／自爲人）對多數人（物化人／自存人）的革命（這是「查斯杜拉屈革命」或「至人革命」（15），這是筆者所提出的範疇）。

葛蘭西不僅是「傳統革命」的思想家和烈士，而且是「查斯杜拉屈革命」的思想家和烈士。

（三）「實踐哲學」

由戰鬥的「人本哲學」發展出「實踐哲學」(PHILOSOPHY OF PRAXIS) (16) 似乎是一種必然（葛蘭西與毛澤東均如此）。在歐州，自恩格斯死後，標榜「科學主義」的實証主義（POSITIVISM）哲學侵入馬克思主義，甚至在不同的程度上支配了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運動（意大利就曾如此；其嚴重的程度，曾引起列寧認真地發動猛烈批評（17）。實証主義者將人類社會行爲「擬自然化」，並把社會科學貶抑在自然科學之下；他們從康哲哲學的「二元論」出發，將人的感性與理性、經驗與思維、實踐與理論相互割裂，將「理性——思維——理論」置於實質上的「不可知論」範疇，而表現爲膜拜「感性——經驗——實踐」的變形「拜物教」〔偽唯物主義——列寧就指出了它的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主觀唯心主義淵源〕。實証主義者一方面抹煞理論／思維乃實踐經驗的「提升」與「質變」（飛躍），從而局限了後者的範疇；另一方面又在該相對狹隘範疇內，宣稱實踐／經驗乃「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且先看看列寧批判實証主義／經驗批判主義時說的話：

「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和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唯物主義，而把教授的經院哲學的無數臆說一脚踢開。當然，在這裏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証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18）。

「實踐標準」以外還有一個「邏輯 思維標準」，後者以前者作基礎，但亦有自己的「相對自主性」，並反過來影響（甚至某種程度上指導）前者。實踐／經驗世界乃「表象」的世界，只有理論／思維才能透破「本質」的世界；二者不可分割，亦相互區別。實証主義是一種「偽實踐論」或「盲目實踐論」，因為它否認「人」在自身「實踐」活動中主觀能動的「本體」地位；正是人文主義的思想傳統，幫助葛蘭西在意大利克服實証主義（黑格爾——克羅齊對此至少是一服「解毒劑」），進而提出真正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論」：

「那似乎實踐哲學單獨能夠推動哲學前進，將它的基礎放在古典德國哲學上，但要避免任何走向唯我主義（**SOLIPISM**）的傾向，……『創造』同時也在指導真實的意義上，使後者並非作為『自存體』，而是作為『自為體』而存在；但這只在於人所模鑄的歷史關係裏，等等。」（19）

葛蘭西的「實踐」，是「人」作為「自為體」的「實踐」（毛澤東亦強調這點（20））。但為要真正批判、而不是簡單地拋棄實証主義，却必須要克服實証主義的內在思想矛盾：

「哲學是知識的秩序，那是不管宗教或『普通感覺』（**COMMON SENSE**）都不能夠是的。可以觀察到宗教與『普通感覺』彼此並不相同，但宗教是『普通感覺』的一個局部因素。……哲學則是對宗教與『普通感覺』的批判與取代。」（21）

葛蘭西將「人」的精神結構分析為「哲學」與「普通感覺」（包括宗教等）兩大範疇，是為著回應實証主義所據的康德「二元論」二分法；但他却終結了「表象世界」與「本質世界」的割裂，終結了對「本質世界」的「不可知論」和對「表象世

界」的膜拜——他為「人」通往這兩個「世界」找到鎖匙（「普通感覺」與「哲學」），並指出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和原料」，後者是前者的「批判與取代」。

他的「普通感覺」又可等同為「意識形態」（**IDEOLOGY**）：「意識形態是一種『感性主義』（**SENSATIONALISM**）的情狀。」（22）至此，我們已可清晰看到，後來亞爾杜塞爾（**LOUIS ALTHUSSER**）提出「意識形態實踐」（**IDEOLOGICAL PRACTICE**）與「科學實踐」（**SCIENTIFIC PRACTICE**）（23）的葛蘭西思想根源——前者正等同為「普通感覺」，後者則是「哲學」／「知識的秩序」；而前者向後者發展有一個「質變」的「飛躍」：「意識決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批判與取代」。以葛蘭西的「實踐哲學」作橋樑，亞爾杜塞爾哲學的最大意義，在於從康德「二元論」及實証主義的內在思想矛盾出發，達到對有關矛盾的一些基本方面的「克服」（本質批判）——一般「實踐」是統籌整個「表象世界」／「本質世界」割裂的縫合劑，但在不同層次領域却有不同意義的特殊「實踐」；物質領域的「經濟實踐」、「政治實踐」是基礎，精神領域的「意識形態實踐」、「科學實踐」是具有「相對自主性」及「反作用力」的升華。這在最後結論上，與毛澤東的「實踐—理論—實踐」（24）綜合體是一致的（雖然毛澤東思想在「理論實踐」上有簡化傾向；而亞爾杜塞爾則由於「政治實踐」方面的粗疏與簡化，而成某種以「結構—超結構」綜合決定為名，抽空或壓縮「超結構」具體內容為實的宿命唯心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亞爾杜塞爾仍未能克服「二元論」陰靈，而比葛蘭西哲學倒退。

在葛蘭西思想裏，只有哲學／科學的「思辯內在」（**SPECULATIVE IMMANENCE**），可以透破客觀「真實內在」（**REALIST IMMANENCE**）的「本質世界」；但其間必須有一道連接包容客觀「真實內在」的「表象世界」的通路——那就是「

普通感覺」或「意識形態」。從「認識論」角度看來，「意識形態」雖屬較低層次；但從「本體論」角度看來，「意識形態」却直接通往「人」自身的「存在本體」（生存動力）。無論在「實踐→理論」範疇或「理論→實踐」範疇，那個「→」就是「意識形態」；「理論」只能夠發揮「人」的理性力量，唯有「意識形態」才能夠觸動「人」的深藏生命力本源：非理性的「存在」。這裏，我們終於發現了所謂「宗教本質」的所在（葛蘭西就指出了「宗教是『普通感覺』的一個局部因素」

（25）），那是哲學所由以出發、科學所不能全部取代的，那是人類一切革命運動及每一個革命人（非異化人）所必具的。葛蘭西說：「『意識形態』自身一定要作歷史的分析，用實踐哲學的話來說，就是超結構（**SUPERSTRUCTURE**）。」（26）亞爾杜塞爾也認識到：「人類社會秘藏意識形態，作為他們的歷史呼吸和生命所必不可少的珍貴因素。」（27）是非理性的、「宗教本質」所在的「意識形態」，支撐著真正的理性，而理性則只能為「意識形態」提供解釋和方向而已；只有「意識形態／科學理論綜合體」，才能真正克服「宗教本質」的膜拜局限（盲目狂熱性）和「理性主義」的割離局限（宿命冷漠性），而同時將「宗教本質」的革命功能（創造規律）和「理性主義」的科學功能（掌握規律）充份發展起來。

這種「意識形態／科學理論綜合體」（或「實踐—理論—實踐綜合體」），就是葛蘭西的所謂「歷史組合」（**HISTORICAL BLOC**，後面會詳談）。意識形態和理論（哲學）不僅是「能動的」（「超結構」），而且是「集體的」、「歷史的」：

「普通感覺是一個集體名詞，如同宗教：那裏不僅是一種普通感覺，那同時是歷史的產物和歷史進程的一部份。」（28）

「『歷史組合』的概念，正確地是物質力量作為內容，意識形態作為形式，雖然這種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區別，具有純粹

指導的價值；但物質力量不可以歷史地想象為沒有形式，而意識形態缺乏物質力量也只不過是個人空想。」（29）

「歷史與哲學乃不可分割，他們形成一個組合（BLOC）。」（30）

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科學理論綜合體」式解放（真正的個性解放），必須首先投身到超越個人的集體鬥爭、物質力量鬥爭、歷史鬥爭裏。「歷史感」是一種源於「意識形態」／「宗教本質」的革命功能（個人感覺到從屬於歷史的大流而在其中發生「能動」作用），哲學理論亦可加強個人對此感覺的認識（自覺）。可以說，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是「個體人」在集體關係／物質力量／歷史中「實踐」自己生命的理論，那是一種真正辯證的「傳統革命」（集體革命）理論，也是一種真正戰鬥的「查斯杜拉屈革命」（個性解放）理論。我們可以據葛蘭西思想而窺視到，在將來的理想世界裏，「普羅米修斯」將無需再作為「普羅米修斯」，而由一個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知生知死」的普通「能動人」／「自為人」所取代（13）；是這些「保住自己個性」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個人」佔有「全部生產力」、「消滅著私有制」和「推翻國家」（32）。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而且是「人的革命」；我們只有掌握到這個角度，才能比較深刻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葛蘭西，理解毛澤東及那失敗了的中國「文化大革命」。

所以，葛蘭西提出「人皆哲學家」：「原則必須首先建立在所有人都是「哲學家」上，也就是說，在職業性或「專技性」哲學家與所有其他人之間，分別只有「量」的意義而沒有「質」的意義。……哲學家可以稱為一種與非技術性勞動者相較的「專門工人」（SPECIALISED WORKER），……但專門哲學家與其他人的相同性，還要大於其他專家。」（33）哲學／理論是每一個人把握自己「意識形態」、自己生命「實踐」的

「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所以，葛蘭西提出「真正的哲學家乃政治家」：

「在這種意義上真正的哲學家是，並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他，一個政治家；能動的人塑造環境，並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的環境整體關係所理解。」（34）「實踐哲學」使「人」成為真正「能動的人」、自覺「改造世界」的「人」——即本質意義上的「政治人」、「革命人」與「自為人」。

所以，葛蘭西不能容忍布哈林將馬克思主義貶降為僅僅一種「社會學」（35）：他猛烈批判「社會學」實質上是實証主義的「非哲學產物」，將人類的歷史與政治事實「擬自然科學化」，是庸俗進化論（36）；並指責「社會學」雖標榜「因果規律」，但實質並未脫出單純「事實觀察」（37）。葛蘭西非常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本質，並認為假如它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學」的話，亦只能是作為「實踐哲學」產物的歷史能動的、革命的、人民的「社會學」。

所以，葛蘭西提出「實踐哲學」負有「創造新文化」的使命：「實踐哲學擁有一個現代文化的『時機』（MOMENT）。在某種延伸上，它決定或豐富某種文化的潮流。……最重要的哲學綜合，要在實踐哲學與不同的理念傾向間發生。」（38）哲學來自以生活實踐為本源的「意識形態質變」，但它本身的「理論實踐」却創造新價值標準，並反過來在生活實踐上創造「新文化」和「新生活方式」。

（四）「歷史組合」／「霸權」 （反「拜占庭主義」）

人本／實踐哲學強調「人」的「本體性」和「能動性」，必然反對宿命唯心主義的偽唯物主義（機械唯物論）。在歷史分析和社會現實分析中，葛蘭西提出了一個古典馬克思主義所

無的「歷史組合」概念：

「結構與超結構合成一個『歷史組合』。也就是說一個綜合體（**COMPLEX**），超結構整體的矛盾和不和諧，乃社會生產關係整體的反映。由此出發，人們可以總結：只有整體性（**TOTALITARIAN**）的意識形態系統，給予結構矛盾以理性的反映，並表現為實踐革命的客觀條件存在。……這種『理性』（**RATIONAL**）是一個能動的與實存的真實。那以結構與超結構之間的必然互動為基礎，而這種互動正就是真正的辯證過程。」（39）

葛蘭西的所謂「超結構」，在自然與精神的關係上指「精神」、在物與人的關係上指「人」、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上指「上層建築」、在生產關係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上指「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與理性的關係上指「理性」、在體制與革命的關係上指「革命」（相對之下，每一對偶矛盾中的另一個方面，便都是所謂「結構」）。葛蘭西思想的重點，是指出「超結構」一方面作為「結構」的「反映」，另一方面為相對獨立實體並反過來推動「結構」（「互動」）——這是對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發展，也是對實証主義／經驗主義、布哈林「庸俗唯物論」、斯大林「經濟決定論」的實質批判。

然而，葛蘭西並沒有在反實証主義及機械唯物主義傾向的同時，跌到黑格爾／克羅齊式的「演化論」陷阱裏（前面在批判抽象「人的本質」時已談過這點）——葛蘭西將之稱為「拜占庭主義」（**BYZANTINISM**）即「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正如盧卡契（**LUKACS**）理論是韋伯（**WEBER**）與森穆爾（**SIMMEL**）反實証主義社會學的綜合結果，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亦發展自他對克羅齊的批判。」（40）盧卡契終於跳不出「人的本質」演化為「社會關係」的黑格爾陰靈，但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卻像馬克思將「顛倒」了的黑格爾「端正」過來一樣，也將「顛倒」了的克羅齊「端正」過來

。葛蘭西的「超結構」，是與「結構」作為基礎的馬克思基本理論結合起來的。

在作為「結構／超結構綜合體」的「歷史組合」裏，「結構」與「超結構」之間存在着一條「運動性過渡」的「加泰爾西斯」（CATHARSIS）之路：

「『加泰爾西斯』一詞可應用於指示由純粹經濟（或利己情緒）通往倫理—政治『時機』（MOMENT）的道路，那是人們觀念裏結構進到超結構的優勢操作。這也可同時意味著，由『客觀往主觀』及『必然往自由』之路。」（41）

可知，「歷史組合」是一種關乎歷史與個人的矛盾「對立統一體」，其內在矛盾是可以轉化與發展的；這一方面可解釋為「歷史」的「客體解放」（由經濟價值「轉移」往人本價值），另一方面也可解釋為「個人」的「主體解放」（由必然領域「飛躍」往自由領域）。任何具體的「歷史組合」，都是帶有條件性的相對統一狀態——由「相對」中引出「變化」、「發展」，便自然要產生一個哲學意義的「引導性力量」觀念：葛蘭西名之曰「霸權」（HEGEMONY 或譯「領導權」）（42）〔這有點類似於毛澤東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43），但又並非經常相象〕。「霸權」是特定「歷史組合」中打破舊平衡、建立新平衡的「引導性力量」，但它不能孤立地抽空存在，而必須立足於不同的特定「歷史組合」中；即既受後者的客觀制約，又反過來推動後者的「量變」（同一「歷史組合」範疇內的結構改革）與「質變」（新「歷史組合」取代舊「歷史組合」的革命）

若落到各種社會關係層次，「霸權」便體現為一種超級的主導傾向——正是以此為觀念中心，葛蘭西再發展出他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現代治權（MODERN PRINCE）、文化、倫理、教育、結構改革等方面的理論。顯然，葛蘭西思想與毛澤東思想——「西」—「東」互相輝映，各從不同途徑出發，而在